

# 浅析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特点

赵爱龙 夏耕 邓越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于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本文以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为出发点,逐步剖析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演化的实质。

【关键词】孤立主义 支援抗战 调停国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5-0112-03

## 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破产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长期采取了“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及其主张要使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美国对此袖手旁观,漠然置之。第二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声称“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sup>[1](P88)</sup>。并补充说“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根据条约所享有的合法条约的权利;美国不过问日本的任何活动,但不得破坏美国的权利”<sup>[2](P94)</sup>。这就是美国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所谓“检疫隔离”的演说“世界性的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当人类的瘟疫开始蔓延时,居民区的人民同意并协力把瘟疫患者进行隔离,以保卫居民的卫生,防止瘟疫扩散”<sup>[3](P219)</sup>。无论是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还是罗斯福的“检疫隔离”都是从美国远离战争这个角度出发。

从1937年12月帕奈号事件到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在这五年时间里,日本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咄咄逼人,而美国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美国国会在1935和1937年制定和通过了一部“中立法”。中立法“禁止给与交战国的贷款或其他财务援助(不论战争的原因为何),并对相关各方禁运武器(不论受害的是哪一方)。以现金购买非军用的物资,须以非美国籍船只运送才可获准”<sup>[4](P350)</sup>。虽然日本对华战争不断扩大,受“中立法”的制约,美国并没有把日本发动战争所急需的石油和其它战略物资列为禁运的对象。“中立法”对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遭受侵略的国家往往经济落后和武器装备低劣。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对世界发出最后通牒,美国感到自己的利益已受到严重威胁,从而象征性地对日本实行石油和其它物资的禁运,于是日本开始寻求和美国谈判,但是日本的要价太高,美国难以接受。但在美日谈判的最后时刻“美国企图与日本寻求思想和行动的和谐一致”<sup>[5](P165)</sup>。这种政策由于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被战争的车轮压的彻底破产。曾经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说,“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sup>[6](41-42)</sup>。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把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永远废除了。绥靖政策的实质是袖手旁观,这样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绥靖在“孤立主义下所维持的最后一点脆弱的和平已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采取对法西斯主义妥协的和平。”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美国也慢慢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加快了与中国人民并肩抵抗日本侵略的步伐。

## 二、中美合作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

### (一)美国带头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想让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而此时的中国单独抗战已坚持整整五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方面,国军主力已退守大西南,日寇占领了中国最富庶东南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战线拉得过长,导致兵力的短缺,于是向蒋介石政府撤出“媾合”的和谈烟幕,诱使蒋投降。为了不使蒋介石倒向日本,美国发起了一场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运动。1943年初,美英两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新条约,正式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尽管废约运动是针对日本而改变对华政策,而且废约也并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加强了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等盟国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参与处理世界事务和积极对日作战。

\* 作者简介:赵爱龙(1982—),男,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夏耕(1958—),男,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邓越,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在西方列强侵华的国家中,美国也曾担任过不光彩的角色。为了改变自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不良形象,美国在这场废约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而且这场废约运动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支持,这为以后美国调停国共关系埋下了伏笔。罗斯福本人及其政府积极支持这场运动,显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适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美国对世界殖民地的态度和战后对世界秩序安排的设想。

总之废约运动是从政治角度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方式。对美国来说,只有废除了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才能更好的使中国抗战;反过来,中国只有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才能加强与美国等盟国的关系,才能更好地配合盟国对法西斯国家作战。

(二)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支持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积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参战。美国除了增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之外,也力图在政治上使中国成为亚洲的强国和领导者。1942年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罗斯福提出他的“四大警察”理论及战后对世界的安排设想。而中国是作为“四大警察”之一被列为其中的。霍普金斯致函丘吉尔,称罗斯福此一构想的内容是“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到一种制度,只准许英国、美国、苏联或许中国等大国可以拥有武装。这些‘警察’将会作为维持和平”<sup>[4](P351-352)</sup>。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支持中国成为“四大警察”之一呢?一方面是为了美国和中国共同抗战,击败日本法西斯;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了抗战中中国人民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以及蒋介石政府对自己实施世界战略意图的帮助。于是美国选择了支持中国的做法。

美国积极支持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道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942年由罗斯福总统提议,中国是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领衔签字。1943年初罗斯福说服英国和苏联放弃敌视中国的偏见,于同年10月在苏联召开了“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会议。中国能参加这次会议与美国的支持紧密相连。美国为了加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以及实现战后对世界秩序的安排,积极主张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由于苏联受《苏日中立条约》的限制不同意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因此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召开了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这是美国支持中国成为强国的显著标志之一。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商讨对日积极作战外,美国承认了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合理要求和正当利益,如收回满洲、台湾等。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对中国的一大支持,也更进一步把中国带入了世界国际体系中。尽管中国国力贫弱,这个“强国”也名不副实,但在其理论上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

三、“调停”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选择

在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中共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主要是因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牵制了大量日军的进攻。1944年美国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赴延安,这是美国政府在军事上接触中共的开始,这对延安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向外界宣传和争取外援的绝好机会,得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欢迎。调查团不仅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很强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也看到了

延安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气氛。因此这些人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同年罗斯福派赫尔利将军使华,除了防止国民政府之崩溃和调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外,一个主要的使命是“力求击败日本,统一中国之所有作战武力”<sup>[7](P49)</sup>。赫尔利取道苏联,并与当时的苏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并谈及自己这次访华的使命,即“赫尔利所负使命,即为统一中国所有武力,以其对日制胜。故此一任务之能否成功,端视关于此事之国共谈判进展情形如何以为断”<sup>[7](P63)</sup>。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是希望由谁来武力统一中国,而是希望用政治的手段迫使中共交出自己的武装。

赫尔利使华的任务能否完成呢?这位缺少洞见的美国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国共根本利益之所在。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商谈,双方随即起草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之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涉及了国民党的改组,承认共产党和其它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的问题等。满怀信心的赫尔利当把这一协议递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很吃惊,并且气得暴跳如雷,全面否决这一协议。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胜利和国内和平要求的高涨,蒋介石在1945年3月1日的宪政筹备委员会演说词中重申了解决共产党问题必须要用政治途径的意向,“政府之立场系原容纳各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派)领袖参加政府,惟在革命大会召开以前,国民党不能放弃其最后决策权及其最后责任”<sup>[7](P56)</sup>。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与赫尔利调解有关。

赫尔利和毛泽东共同签名的草案遭到蒋介石否决后,赫尔利并没有放弃这一调停的努力,但在和蒋介石的交往过程中,其个人态度逐渐偏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1945年元月朱德将军要求向美国贷两千万美元去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更有力的打击日军。但这一合理建议遭到赫尔利的坚决拒绝,并建议罗斯福总统清洗美军延安军事观察团中的亲共分子。于是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建议,并帮助赫尔利对在中国服务的美军人员中的亲共分子进行了清洗,他们调回了美军观察团的包瑞德、戴维斯和伯德等人。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宣布“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sup>[8](P163)</sup>。这种反共的立场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并且警告美国这种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将给美国政府和亿万人民带来“无穷祸害”。赫尔利的反共立场鼓舞了蒋介石,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蒋发言时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sup>[9](P1047)</sup>。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为了迫使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军民也在其它战线对日发起最后一击,8月15日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面对突如其来的投降,蒋介石一方面发电给中共18路集团军,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另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汉奸伪军积极推进,“收复失地”,以防止共产党占领这些地区。就在此时,作为战时的盟国,美国向蒋介石伸出了友谊

之手,宣布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麦克阿瑟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战区日军下令,日本军队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投降。这种不公平的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共的不满和坚决反对,他们以实际行动抵制了这些政策。

尽管美国扶蒋的政策不变,但其对蒋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危机是有所顾虑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评估蒋介石的经济形势时说,“军事支出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从而在我被催逼着提出由美国政府提供各种贷款时,使国民政府为支持广泛的军事努力而造成了财力上的真空。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陷入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sup>[10](P166)]</sup>。可以看出美国战后对华的政策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支持蒋政权(主要表现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另一个主题是防止中国赤化。

由于赫尔利在调解国共关系时所表现对国民党的偏袒,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和愤慨。1945年8月回国述职,从此退出了调停的历史舞台。当然,我们不能全面否定赫尔利的调停努力。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最高层,尤其是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及双方最终签署《会谈纪要》,都与赫尔利是分不开的。

1945年12月5日,在马歇尔即将启程赴华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主要内容有“美国及其它联合国国家承认现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杜鲁门的语调是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因为在当时还没有其它的力量统治整个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随后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他们一致赞同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之政府,一切事务在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从而建立一个团结和民主的中国,以防止中国可能出现的内战。就在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时,对这个政府的前景产生了担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总裁被赋予至高权力,并在类似美国政府有关检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sup>[11](P23)]</sup>。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其矛盾性的一面,为了解决矛盾,美国提出了在支持蒋介石的前提下,改组国民政府。王世杰日记记载在12月20日马歇尔出席蒋介石的欢迎宴会上对蒋说出了他使华的原因,“餐后马氏语蒋先生略云:杜鲁门愿予中国战后复兴之一切援助,惟只能于美国舆论赞援之情形下为之”<sup>[12]</sup>。马歇尔在此说了两件事,一是蒋介石政权要改革,二是我给你所需要的经费。由于蒋介石还没有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在求和平和团结成为第一要务的特殊背景下,不得不做出了“改革”的形象。但是美国的外交官员并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蒋介石所做的“民主秀”而已。在蒋介石的“假和谈”下,美国政府一相情愿的去执行其制定的在中国的民主进程路线,即美国根据战后法国的建国方式和中国国内的情况竭力主张在中国塑造一个反对党,共同推进中国民主之进程。正如马歇尔在华调停快失败时所说“政府的改革和现代化有赖于缔造一个反对党,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

作出重大的贡献”<sup>[10](P388)]</sup>。

通过上文可以明显的得出马歇尔使华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四点:(1)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不动摇;(2)使蒋政权成为亲美政权;(3)在中国塑造反对党,改组国民政府;(4)反对国共内战。在抗战胜利后,要求国内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而改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共同欢迎的。所以后两条都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但从整体出发,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主要表现在第一点和第三、四条之间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利用由于民族抗战胜利带来的民族自信心和军队高涨的士气去积极引导本国的重建,而是打起了内战的主意,进而激起了人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和失望。但是作为调停者的马歇尔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人民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支持程度。而后两条是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但必然会触动蒋的统治地位,蒋介石能答应吗?于是马歇尔的调停立场即支持蒋介石的统治立即在中国民众中失去了市场。

美国的这种立场是主观认识和现实的相悖。一方面马歇尔使华是为了支持并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似乎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要求。于是美国政府寻求解决这一对矛盾的途径,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美国扶蒋政策注定要失败,也注定马歇尔调停失败的命运。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总体来说是随着自身利益和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从中国自身角度来看,美国对华政策表现了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派遣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停国共关系,不自觉地充当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工具,走向人民的反面,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

注释:

大公报.1945-12杜鲁门声明当时有多种译文,本篇采用《大公报》译文。

参考文献:

- [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2]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M].新华出版社,1984.
- [3]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政策,1932-1945.中译本(上册)[M].
- [4]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2003.
- [5]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M].
- [6]彼得·洛[美].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M].1937—1941.
- [7]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关系[C].文海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出版.
- [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第七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9]王俯民.蒋介石评传(下册)[M].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马歇尔使华[M].中华书局,1981.
- [11][美]肯尼斯·雷等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 [12]王世杰.王世杰日记.1945-12-21[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9年出版.